

第五章 結論

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為求施政的順利與周延，在展開各項措施前，大抵都會進行相關的調查研究，進而擬訂妥當的發展計畫。總督府除了任用內部的人員之外，也極為倚重外界的協助；其中，學者專家由於具備專業知識，往往能提供重要的參考意見，影響當局的決策。因此，近年來研究者開始關注此一歷史課題。本文針對官房調查課進行的事業，從組織與功能之變遷、人事任用之特色、調查人員的能力、調查成果的流通及其評價、學者專家參與調查之經緯、納卯移民地調查的時代意義等角度加以析論，期能適切理解該課的作為及日本殖民統治的特質。

調查課在台灣總督府調查事業上具有承先啓後的歷史意義。首先，調查課與舊慣調查會之間具有相當程度的關係。舊慣調查事業前後歷時十五年，耗費近百萬圓，網羅數百位知名人士及學者專家；其中，首任調查課課長片山秀太郎即是該會的委員之一；調查課的關係者如木村增太郎和小川尚義，也參與舊慣調查。¹如前所述，1915年東鄉實建議當局改造舊慣調查會，使其成為南方研究的一大機構，東鄉日後亦曾擔任調查課課長。再者，調查課的核心人物原口竹次郎最初也是舊慣調查會囑託。此外，該課所屬職員中亦不乏先前任職舊慣調查會者。因此，總督府的調查事業在某種程度上，可謂一脈相承。尤其，調查課除了重視既有的研究人才，也積極延攬各方面的學者專家，以充實該課的陣容。

輿論界的鼓吹對總督府設立調查課，發揮推波助瀾的作用；一方面檢討向來調查之不足，同時，陳述應採行的方式，給予當局許多寶貴的參考意見。最初幾年，時人主張擴充調查課的功能，可見對該課的期待頗深，也反映台灣對於南支南洋的關心有增無減。1918至1935年間，調查課從事南支南洋等海外的制度與經濟調查，1935年9月移

¹ 尾崎秀真，〈本島に於ける舊慣調査の事業〉，《社會事業の友》第69號（台北：台灣社會事業協會，1934.8），頁3。

交給恢復設置的外事課。調查課儘管失去原有的特色，不過，依然憑藉長年從事統計所累積的經驗，進行資源調查、總動員業務、家計調查、情報宣傳等工作。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底原口卸任之後，繼任的統計官由資源局推薦來台，反映日本中央企圖規劃台灣資源的運用。然而，調查課與設立之初的主旨漸行漸遠，重心轉移至台灣內部。因此，總督府重新編制官房，1939年7月新成立企畫部，正式取代調查課的職權。

為確保調查成果的品質，調查人員必須擁有良好的外語和研究能力。調查課基於培養人才的觀念，有計畫交付任務給部屬，藉以訓練其消化資料及撰寫報告之能力。調查課成員負責華南和東南亞的調查，在得天獨厚的環境下工作，故能充分了解各地的動向。隨著1930年代日本國內急需南方研究的人才，不少人遂紛紛離開台灣。東亞經濟調查局即聘請資深的中國研究者井出季和太等人前去就職。²事實上，滿鐵調查部也從台灣尋找人才。³持平而言，想轉換至條件較好的職場，為人之常情，總督府對此也有所了解。⁴無論如何，此一特殊的人才外流之現象，也充分說明台灣所培訓的調查人員，的確身價不凡。至於任職調查課的台灣人，絕大多數擔任雇員，奉命行事；其中，李讚生和林開煥二人的學、經歷俱佳，其工作經驗並有效延續至戰後。

長達二十年間，調查課發行爲數眾多的出版品，並透過一定的管道，受到各界歡迎及利用。總督府爲提升行政效率，減少不必要的錯誤，自始即相當注重統計工作。因此，在統計業務方面，調查課得以

² 詳閱：中村孝志，〈私說「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南方文化》第13輯（天理南方文化研究會，1986.11），頁193~211。

³ 例如野野村一雄（1935年大阪商科大學畢業）於1938年來台主編《高雄商工時報》，一年之後，任職滿鐵調查部的大學同學狹間源三詢問是否有意願前往大連，於是野野村決定應聘；不過，由於離職得太快，受到當初推薦其來台的母校老師嚴厲指責。參閱：氏著，《回想 滿鐵調查部》（東京：勁草書房，1986.4），頁1~7。

⁴ 例如著名的歷史學家前嶋信次於1928年自東京帝大東洋史學科畢業之後，隨即來台擔任教職，1940年5月辭去台南第一中學校教諭；形式上，前嶋以私人理由希望能獲准辭職，但文件顯示當局知悉其轉任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囑託一事。參見：第10104冊《昭和十五年五月高等官進退原議》，第61號〈依願免本官：前嶋信次〉。

繼承台灣統計協會與統計課的基礎。統計出版品包括人口動態統計、犯罪統計、台灣事情及統計書等，為總督府制訂各種政策的重要參考資料。京都帝大教授內田銀藏、東京帝大教授高野岩三郎及台北帝大副教授植松正基於各自的學術關懷，利用其探討台灣社會的變化，更可見統計出版品的流通使得各界能精確掌握台灣的情況。

在調查業務方面，調查課發行大量的書刊，並透過全國經濟調查機關聯合會分送各相關機構，也經常刊登《台灣時報》之上，不斷普及調查成果。平常，調查課也將重要的訊息傳達給有關單位，在日本帝國的情報體系中扮演積極的角色。尤其，二次大戰期間總督府無法像過去一樣從容進行南方調查，於是外事部再版不少《南支那及南洋調查書》。⁵更可見調查課的調查研究並未因年代久遠而被忽視，實有助於日本進行南方統治。

1920年代中葉為調查課出版報告書的高峰期。總督府極為關注中國的貿易等情勢之演變，以多樣的方式蒐集各種資訊，因應可能發生的經濟問題。其次，當局聘請學者專家進行東南亞的海運、畜產、漁業、熱帶栽培業等調查，作者群以台灣為中心提出發展策略，供當局作為參考，清楚顯示調查的目的乃是為了研擬南進政策，經濟的考量格外明顯。⁶調查課的經費大抵由「南支那及南洋施設費」支出，有時與其它單位共同分擔。每一次的撥款皆得到府內高層的認可。⁷總督府運用施設費從事調查，也講求補助南洋日本人企業的方法，二者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正如1929年底《臺灣日日新報》社論所指出的：華

⁵ 佐多則昭，〈台灣南方調査の回顧〉，《日本植民地史3 台灣・南洋》（東京：毎日新聞社，1978.10），頁166。

⁶ 1942年美國人葛超智（George H. Kerr）撰寫〈台灣：殖民實驗室〉一文，即引述1938年由國際日本協會出版、內藤英雄編輯的《台灣：一段獨特的殖民史》，指出日本的南方政策必須取得熱帶領土，並在共存共榮的基礎上拓展經濟。詳閱：《葛超智先生文集》（台北：台北市228紀念館，2000.12），頁13~18。

⁷ 該筆經費的使用，1919年10月以降即由參事官（專任）、內務局長、財務局長、殖產局長、警務局長、調查課長、外事課長等加以協議。參見：第2919冊《大正八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九卷》，第33號〈南支南洋施設費運用ノ件〉。當局發給調查人員的津貼金額，或按其資歷，或依照考察時地之不同而有所差異，但有一定的計算標準。詳細的情形，有待利用會計方面的資料加以探討。

南銀行根據調查的結果進行貸款，總督府再補助利息給企業，「南支南洋施設費」可說真正要發揮其使命與效力；新的補助辦法能夠實現，主要依靠長期以來負責調查南支南洋情況的官房調查課。⁸

關於學者參與調查的實際成效，本文以菲律賓為主作一探討。菲律賓鄰近台灣，又處在美國的統治下，其各項措施對總督府而言具有高度的參考價值。當局不時派員進行實地考察，也透過外務方面的管道處理相關事務。尤其，調查課、外事課、台灣南方協會及台北帝大為主的學者專家，持續建構總督府對菲律賓的認識。

岷答那峨的納卯為日本人在南洋的一大移民據點，根據初步的分析，調查報告書中對當地有二種截然不同的觀察。慶應大學副教授隈川八郎不僅修正海南產業的調查結果，更提出健全當地日本人生活基礎的可行途徑，其意見除了受到外務省的重視，1940年台灣拓殖株式會社主張鼓勵南洋移民時，主要的依據亦是隈川當年的考察成果。其論點經得起考驗，可以說是學者與殖民統治結合的成功個案。

要之，總督府設立調查課進行華南和東南亞的調查，除了掌握鄰近區域情勢演變的現實需要之外，也能傳達給日本國內及其統治地區，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當局委託各種背景的學者專家從事調查，在具體的年度成績與一系列的報告書之外，調查心得往往透過演講等方式發表出來；或者涉及機密，僅能容許內部加以討論。因此，如何評估其效果是一個嚴肅的史學課題。尤其，複雜的人際關係牽動總督府調查人員的去留，亦有待發掘更多的史料再深入加以論證。

⁸ 《臺灣日日新報》，1929.12.15，〈經濟南進に新しき一步〉。